

みんなくりポジトリ

国立民族学博物館学術情報リポジトリ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

在大溪地客家與唐人之間：由Mandarin（華語）談起

メタデータ	言語: zho 出版者: 公開日: 2020-03-30 キーワード (Ja): キーワード (En): 作成者: 童, 元昭 メールアドレス: 所属:
URL	https://doi.org/10.15021/00009537

在大溪地客家與唐人之間

— 由 Mandarin (華語) 談起

Between the Tahitian Hakka and Tangren (唐人): A Study of Mandarin Language Use in Tahiti

童 元昭

TUNG Yuan-Chao

Abstract: The majority of Chinese in Tahiti are Hakka, and a few are descendants of Cantonese-speaking immigrants. This distinction of ancestral origin is due to the different places of recruitment. The development of Cantonese immigrants was different from that of Hakka immigrants, resulting in the fact that the majority of Chinese in Tahiti are Hakka descendant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emergence of the Hakka consciousness by examining the language choices between Hakka and Mandarin made mainly for teaching. I analyze the anniversary collections of two major associations published respectively in 1971 and 2018, field notes and online literature. Since the Hakkas make up the majority of Chinese in Tahiti, the elders used to talk in Hakka. However, the strong nationalist sentiment of the past generation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associations and their new-born republic, and the transnational Chinese diasporic network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collective identity of a Chinese community transcending language differences. As a result, the language of instruction at various schools supported by associations has been Mandarin. However, the teaching of Hakka language in the 1990s has stimulated discuss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languages.

大溪地客家人轉變為 *la communauté chinoise* 有歷史政治與經濟上的特殊脈絡。二次世界大戰後，中國內部政權更迭，使得僑鄉在僑民文化再生產上不再能擔任重要的腳色。法國政府在戰後引入小學畢業資格考等諸多積極措施，華人在1950年代開始尋求法國公民身分。幾近同時，法國面臨阿爾及利亞的獨立戰爭，而規劃將撒哈拉沙漠的核子試驗中心遷移到法屬波里尼西亞。出於核子設施的國安顧慮，法國為防範外國政府藉口僑務而有的干預，逐漸放鬆中國公民（ROC）的歸化申請，相對地也要求中國僑民結束獨立的中文學校¹⁾。

在這過程中，中文學校典型的由原先獨立的教育體制，先須接受等同法國中小學的畢業學力考試，增加法文課的時數，減少中文課的時數，增加法語老師，到完全遵守法國小學學制，並由法國老師負責等，一步步的納入了法屬波里尼西亞的教育體制。一旦接受法國官方的教育考核與檢驗，原有的教學便顯得不具有競爭力，幾年之中，學生銳減，終於在1964年關閉，完成了教育體制的替換（Saura 2002 : 138-140）。

Saura 對比了1962年與1996年間隔34年的統計，呈現出華語書寫與言說能力的大幅下

降。1962年的調查中，61%的成年人可以說寫華語，但在15-19年齡層已下降到47% (Saura 2002 : 352-353)。1996年的統計中，在波里尼西亞出生14歲以下的人口，有1,396人常用華語，但在15-20學齡這一群人僅有18人，20-29層再上升到82人，隨著年齡提高，人數逐漸上升。

1 從客語到「國語班」

在1960年代以前，大溪地祖籍為惠陽、東莞與寶安的客家人聚集在首府 Papeete 市場附近的商業區，住商合一，幾條街的範圍內滿足了家庭，社團、學校與經濟活動。生命儀禮與歲時祭儀推動客家人與粵語本地人 (punti)²⁾ 的社會生活與人的養成。家庭生活與商業上以客語為主，零售業與農漁產品的收購上則需要大溪地的 ma'ohi 語。學校教育內容主要在讀書識字，從1920年代起，三個社團開設的學校都以客語為教學語言，但在1950年中華民國第一任駐大溪地總領事的建議下，改為 mandarin (華語)。1957年第二任總領事在中華會館開設針對成年人的「國語夜課班」，並籌辦了「中華書畫研究社」，增加大溪地出生的世代，接觸華語以及文化的機會。(不知名 1971)。中華會館慶祝五十周年金禧時，稱為「識字知禮」，識字便意味著掌握了背後的價值體系。

相對於客語的家常，華語是流通的，國際性的語言。在「中華會館五十周年紀念冊」中，記錄下當時主席丘漢興先生的致詞，其中提到「近十年來，僑生頗多做世界旅遊，經過有華僑的地區時，相談之下，都投以驚異的眼光，因為他們知道大溪地的僑生，不但會說中國話，還會寫中國的文字…」(邱 1971a)。僑生指的是在僑居地出生的一代，他們能夠去外地旅遊，必須已經取得法國國籍。華語促進他們與世界各地的華人交流，建立跨國華人的 diasporic network，這充分顯示僑教經營的成就。以邱漢興先生為例，他的經歷反映當時中華會館對僑生的期待。邱漢興於1912年出生於大溪地，是當時極少有的早期的僑生。他在會館的高小畢業，在會館50周年慶時擔任主席，並以中文／華語寫下「中華會館成立開幕回憶」(1971b)。記錄1921年，他九歲所見會館成立時的景況。「紀念冊」收錄了中華書畫研究社成員的書畫作外，還有詩作(圖一)。其中亦有丘漢興的十五首詩(1971c)。對他而言是「邯鄲學步費工夫，平仄難分信口呼…」(邱 1971c) 他的詩作，相較於其他作者的感懷與往還，主題多景觀與風情等，如「澆花」、「賞花」、「釣月」、「白鷺」、「大溪地風習」、「溪山草裙舞」、「拾螺」與「土人擊磚打水捕魚」等。一個「僑生」藉由社團的中文學校與書畫社可以寫中文文章並作詩，在中國境外完成「識字知禮」的養成。

「紀念冊」收集的詩中，有兩首反映出1971年當時對中文教學的期待與最終停辦的哀情。會館長期的理事與秘書陳俠遊先生(1971)做「國語夜課班紀趣」「溪島風成國語狂，紅顏白髮滿門牆；學生半帶鄉音話，不管高低說一場」。相對於滿堂的熱情，另一首「國語班受播弄中輟，寄應各同學」只見停課的哀思。「暴風狂雨動起來，門牆桃李不勝哀；人間無限傷心事，豈獨傷心此一回。」



照片1 中華會館懸掛的字畫，有些出自成員（1987年9月，筆者拍攝）

2 從中華學校轉變為 mandarin 第二外語課

1960年代，法屬玻里尼西亞社會多方面發生了劇烈的變化，緊密的捲入了隨著核子試驗中心而來的福利殖民體系。這一趨勢對華人的影響，間接的經由採取法國生活方式歸化以取得法國籍。法國官方放鬆歸化的審核，歸化的人數迅速增加，終於在1973年新國籍法下，出生在法屬玻里尼西亞的外國人，自動取得法國國籍，不再須經過歸化。政治上正式融入法屬玻里尼西亞之後，為歸化而妥協放棄的中文教育，不再是法國政府需要壓抑的對象。華語終於在中文學校關閉不到20年後，成為公立高中的第二外語課與高中會考的外語選項，與華人脫鉤。(Saura 2002 : 353-354)

3 Mandarin 的外語化與客語的再興

在中文學校關閉之後，華人社團持續開授中文課，但僅限於課後。KMTI與KMTII在周三與周六開課，1989-2003時KMTII亦提供場地由友好的婦女團體在周六教授客家話(姜 2015 : 125-126 ; 已停辦)。授課老師出自大溪地華人的知名大家庭，其夫在議員任上，提出中學教授華語的議案。對他而言，華語無關於家庭親人間尤其是祖孫的交流。要維護華人親人間的親密往來，一定需要透過客家話。客語原本是家庭中使用的語言，但在1960年代起，華人申請歸化時服膺法國人對生活風格的要求包括對家庭型態的檢視，華人住商合一，聚居的商業區出現變化(照片2)。華人開始住商分離，家庭遷出商業區，分布在首府、Pirae、Arue與Punauuia四個地方。由集中的街區分散在不同的地產開發建案內。原



照片 2 即使是華人居多的商業區，店多採拼音（1990年1月，巴巴帝市，筆者拍攝）

先在住商合一的家庭，緊鄰學校與社團的街區，客語在生活中自然習得，但在新的居住空間中，客語的學習成爲個別小家庭的責任。

當客語的傳承終於被意識到不是單一家庭可以擔負的任務時，客語已經結合法語以及大溪地語使用多年。如「bebe, 飲 l'eau l'eau, 阿婆裝你去 l'ecole」, 其中「bebe」、「l'eau」與「l'ecole」是法文，而「飲」、「阿婆」與「裝」是客語的慣用語以及發音。我亦曾經驗過與中年人以客語交談時，句中出現了不懂的詞彙「hamada」, 意指開始。事後詢問他人知是大溪地語，而非說話人以爲的客語。大溪地客語另一個常被提起的特點是詞彙古老。有些用詞由移民帶入當時的習慣用法，而不同於當前的通行的用法。如「皮帶」爲電影、「登高」爲樓上、「電車」爲汽車，顯得過時（姜 2015 : 105 註中有更多的例子）。大溪地在1980年代還有從惠陽、東莞、寶安來的長者，便戲稱大溪地的客家話爲「口水客」, 亦即庶民的簡化的客語。這個評語有著階級的意味，但也反映出移民的初期世代面臨的表達與溝通語言工具不足的困境。

KMTI與KMTII開授中文課，老師的來源是一個難題。大溪地華人社群並沒有培養出本身的教師。從1960到1990年代，教師多爲來自具華人背景的婚姻移民。除了早期有一位



照片3 國民黨第一支部寒暑假的中文課，人多以大廳為教室（1990年7月，筆者拍攝）



照片4 國民黨第一支部平時的教室（1996年1月，筆者拍攝）

泰國華人婚入大溪地，擔任教師，主要依賴台灣婚入的女性。KMTI 早期有一位成員曾去廣州與香港讀書，長期擔任幹部也負責教書。有一位台灣女性在1987年起擔負起教中文的工作，她的教書地點隨著他在不同社團擔任秘書而轉換。一開始他在 KMTII 擔任秘書之餘，也開班教中文，主要是教 Vahine Porinetia（婦女會）的兒孫，此外也自行開班，有大班也有一對一的課程（照片3、4）。曾經有其他台灣女性開課，他也會以特定社團成員家庭為主，以避免競爭。1990年一個周六下午的中文課，有兩大四小六人上課。小孩說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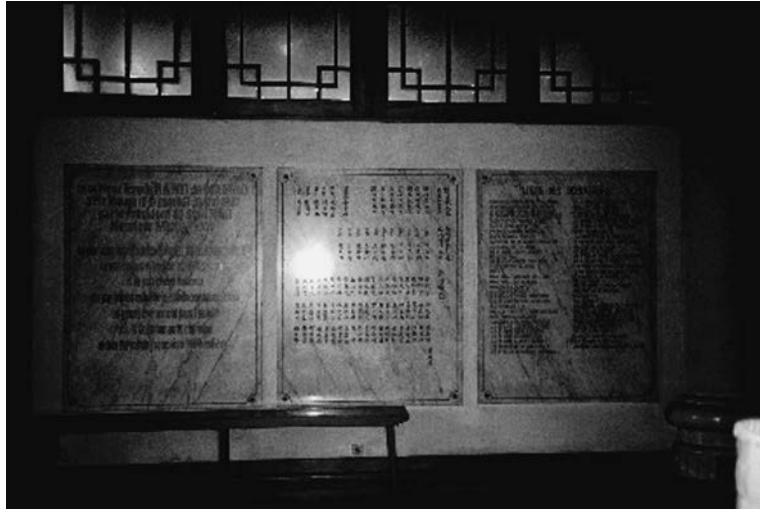
文，大人則夾雜客語以及法文。他的華語教學，以客語為輔。如，小的（細條），下雨（落水）。周一晚則與一位會館成員有一對一的課。KMTI 的中文課，接續在中文學校關閉之後，維持多年。以寒暑假為主，一周五天的上午，在1990年時，約60-70人。2010年代中，KMTII 市中心的建築遭火燒毀；KMTI 的華語課維持至今，甚至增加了一位年輕一代大溪地成長的老師，並在七月與十二月的假期中招收八歲以上的學生（Koo Meng Tong I 2018）。寒暑假整個月的課程，除了華語外，也設計許多的活動。學生的規模也增加第三位台灣婚入女性協助教學。致公堂在2004-5 年間，香港長大的主席，曾在每次會議後教成員華語。

KMTI 與 KMTII 與會館延續1950年開始的作法，以 mandarin 華語為教學工具，而在中文學校結束之後，華語的學習成了僅存的教學目標。客語維持是家庭內私領域的語言，但因華人遷往郊區，住商分離與小家庭等趨勢，小孩失去學習客語的環境。但上述除了一個例子外，中文班僅指 mandarin 華語。客語在大溪地的公立或私人的教學體系內，尚未被認定為一個需要學習的語言，遑論建立一套教材與教法。但在不受國家認可的情況下，大溪地的客家後裔，少數知識份子憑藉個人的力量，向家中長輩收集整理慣用的在地客家字詞等，出版了含量驚人的工具書。這一套客語辭典在客語的教學上帶來的機會，有待進一步的研究。書寫中文在少數場所維持使用，如廟宇，或是農曆新年慶祝活動中的展演（照片5、6、7、8）。

近20年的發展，參考大溪地作家 Jimmy Ly（2013）的觀察，法文甚至是大溪地語是年輕世代達意的語言。他提出了一個新的現象，跨群通婚。由於華人與法國人以及大溪地人通婚建立家庭的情況持續增加，進一步削減了客語在家庭中傳承的機會。



照片5 農曆新年的園遊會上，中華會館長期的中文祕書陳俠遊先生揮毫（1990年4月，筆者拍攝）



照片 6 大溪地關帝廟牆上的沿革與捐款芳名錄等，中法文並陳（1996年 2 月，筆者拍攝）



照片 7 大溪地關帝廟內所安的神案之一（1996年 2 月，筆者拍攝）。

Ly 對於客語的學習感到悲觀，但他也提出客家人的氣質在語言之外，藉由家庭與社團的聯繫以及傳統儀式而得以延續。傳統儀式中，他特別以 kasan（祭祖）為例（Ly 2013：228）。大溪地華人約在 1920 年代起，才逐漸走向社會再生產，成立學校等。其中單身或家人留在家鄉客死異鄉的移民，葬在了信義堂管理的華人公墓，同姓或同鄉等社團春秋祭拜。照片九便是堂號為穎川的陳姓集體祭拜。華人從 1920 年代起在地繁衍，目前以家族共同祭祖為主，沒有系譜關係的同姓或同鄉多由少數社團代表負責。傳統的 kasan 會準備三牲，



照片 8 華人多信仰天主教，文字在農曆年教堂的布置上很顯著（2004年 1 月，筆者拍攝）

現在有時直接跟餐廳訂購，大賣場也在春秋季祭的時間賣配置好整套的金紙香燭等用品（照片10）。根據 Ly（2013），在他行文當時，Arue 的華人公墓在春秋兩祭時，依然人山人海（照片11）。Kasan 的重要性在2018年地方電視台曾做了專訪。Ly 強調客家身分與文化，但除了客語不證自明外，他對於祭祖或烹調並沒有進一步說明其客家的獨特表現³⁾。

雖然 Ly 具有客家意識，但實際上，難以區分客家與唐人兩者（照片12）。主要的原因便是因為客家人構成大溪地華人的主流，不只是人數也是主導，如在法語取得重要性之前，客語是華人社團議事的語言。大溪地另有說不同粵語的七邑人（punti 本地），來自南海、中山、花縣、增城、鶴山、四邑與番禺。甚至早在1930年代，KMT 分裂，形成 KMTI 與 KMTII 時，KMTI 中文學校當時的校長注意到七邑人未參與社團，便邀請他們加入。七邑人平時不敢說粵語，因感受到 KMTI 不區分客家或本地，而紛紛加入。大溪地的粵語人口中，南海人與中山人曾分別組成南海公安會與中山同聯會，社團並擁有自己的場地，但在2000年代後，濃縮為七邑，並在信義堂的管理階層佔有一席之地，而有擔任輪值主席的機會。等同於其他社團如中華會館、致公堂、KMTI、KMTII 與 Vahine Porinetia 等的位階。七邑人在生活上沒有可以明顯區辨之處，因此 Ly 所說的客家文化可以說即是大溪地唐人生活的一般實踐。其中與惠陽、東莞與寶安或台灣客家所熟悉的生活內容，不論是祭祖或烹調，必然會有大溪地地方性的（如魚生）（童 2012）或時間上（如古老詞彙）的差異。

大溪地客家人多知道他們的客家背景，但他們同時也自稱唐人。唐人一詞的出現，相對於「土人」、「半唐人（番）」、「半白」與「白人（鬼）」的脈絡。由於粵語 punti 的隱形，客家人作為一個對應的分類，基本上失去了現身的脈絡。而居於法屬玻里尼西亞的少數，



照片9 陳姓的祭祀，有時由同宗族的幾位代表行禮（1990年4月，筆者拍攝）



照片10 大賣場裡與掃墓有關的商品（1990年4月，筆者拍攝）



照片11 一年春秋祭兩次掃墓，華人公墓人山人海（1990年10月，筆者拍攝）



照片12 農曆新年的園遊會上，中文與法文的布招上以華僑具名（1990年1月，筆者拍攝）

「大溪地唐／華人」(la communauté chinoise) 的身分在地方上取得重要性。認同涉及自我認定與他者的認定，同時具有多重的潛力與彈性。客家人，唐人／華人或 Polynésien d'origine chinoise(祖緣中國的玻里尼西亞人) 等，不同的名稱都有各自的意義，我們必須密切注意各個名稱出現的脈絡以及當事人的主觀觀點。客語或華語的學習對大溪地客家人原先可兼顧並行，但1960年代生活方式的改變，不再能夠在家庭與鄰里間習得客語，而國語成為法國教育體系的外語，對照之下，有人注意到客語與家庭親密關係的特殊連結，而開始了客語教學。

客家人在 mandarin 與客語間選擇學習華語，一部分出自國家政策的引導，一部分出自對書寫中文的重視。大溪地的書寫中文早期延續文人傳統，如「大溪地中華會館五十周年紀念冊」所崇尚的，或是稍晚學校課本的風格。一般正式的公告或文件，社團都有中文秘書負責，或是尋求少數幾位中文寫作能力知名的人代筆，而早在1970年代，華人已有法文寫作的文學作品出版。大溪地華人偶爾會在兩份地方報紙上發布公告，在1990年時，同時採用中文與法文。愈是晚近，日常客語中混用語言的情況，更是拉遠了與書寫中文的距離，而大溪地並未曾引入或發展出如香港的廣府文系統。1990年，我曾聽過長輩鼓勵子孫學習書寫中文，理由之一是在 kasan 掛山時才找得到祖先的墳墓（照片13）。但當然，就像法文化的名字，總是會出現解決問題的辦法⁴⁾。

相對於1971年出版的「大溪地中華會館五十周年紀念冊」完全採用中文，幾乎半世紀之後，Koo Meng Tong I（國民黨第一支部）於2018年所發送的紀念冊，則採用法文。2018年四月的成立一百年的慶祝餐會，開幕時舞台上的兩隻獅子呈現的兩幅字，分別是中文的「1918永續精神，勤奮百年」，與法文的「2018 longue vie KMTI」(Koo Meng Tong I



照片13 祭祖時全家出動 (1990年10月, 筆者拍攝)

2018)。中文刻畫的是過去、是精神；法文簡單有力，不只是已發生過去的事實，也是對未來的祝福。大溪地客家後裔的語言使用從1960年代後，出現顯著的變化。法語成爲主要的語言，而華語在法國外語考試的認證下，獲得制度性的支持，客語僅能依賴私人與家庭的傳承⁵⁾。正如 Ly (2013) 的觀察，大溪地客家的認同，在客語能力薄弱的情況依然在生活中體現、實踐。他們普遍知道客家的背景，但是大溪地的生活脈絡傾向彰顯華人的身分；而在近30年從中國與香港來大溪地的華人，驅使大溪地華人／客家人強調大溪地做爲移居地／diaspora 的地方性。以移民後裔的研究來說，移民生存的環境並非靜態不動，他們在歷史的變動中，如何維持祖先記憶，又如何傳承與創造文化等，又會因在地脈絡各有不同。強化在地實踐面向的研究，將有助於我們對海外客家後裔的理解。

註

- 1) 這裡所說的「中文」或稍後的「國語」是沿用當時使用的習慣，指的是目前所稱的華語 (mandarin)。法國雖然在1963年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但台灣在學校與社團中文教學的師資上影響大。
- 2) 法屬玻里尼西亞的華人最早的一批是在1865年分別由廣州與香港招募的工人，到 Atimaono 的棉花田工作。法國官方的管理方式要求所有人必須加入社團 (congregation)。當時有兩個社團，其中一個信義堂至今成爲華人最重要的社團，而吾行堂已經消失，吾行堂的歷史亦已失傳。一般推測兩個社團分別以客家人與廣府人爲主。信義堂組織上納入的七邑，雖然這七個地方均屬於客語以及廣府話並存的區域，但他們被視爲本地 (punti)。七邑後裔與惠、東、寶的客家人早期在人脈與社交上明顯不同。

- 3) Ly (2013) 認為 kasan 表現出獨特的客家氣質，但並未有進一步的材料支持這一論斷。祭祖是華人常見的行動，但無法說是僅限於客家人的作為。新加坡由廣惠肇三屬共有的碧山亭便是一個例子。由於 kasan 與天主教徒紀念亡者的時間不同，攜帶的祭品也不同，Kasan 的行動的確足以呈現華人的集體性。我同意 kasan 是大溪地華人獨特的社會實踐，但無法確認此舉僅限於客家裔。
- 4) 由於家族成長擴張，以及1960年代申請法國國籍時在姓名上的同化，同一個家族的成員無法由姓氏上推斷出來。這在 kasan 與整體華人認同上，被視為一潛在的威脅。今年 (2019) 信義堂在2017年所辦的相近主題展覽後，再次籌辦了一場 Exposition Siang (姓)，呈現出40個姓氏中文與法文拼音的對照。
- 5) 以法語為主的年輕一代收集了大溪地客家話的詞彙與諺語，編寫於2007年出書 (Sin Chan 2007)。這辭典的效果有待進一步的分析。

參照文獻

〈中文文獻〉

不知名

1971 中華會館簡史，收在《大溪地中華會館五十周年紀念冊》巴比帝。

邱漢興

1971a 大溪地中華會館金禧紀念大會演說詞。收在《大溪地中華會館五十周年紀念冊》巴比帝。

1971b 中華會館成立開幕回憶。收在《大溪地中華會館五十周年紀念冊》巴比帝。

1971c 丘漢興詩十五首，收在《大溪地中華會館五十周年紀念冊》巴比帝。

大溪地中華會館

1971 《大溪地中華會館五十周年紀念冊》巴比帝：自行出版。

姜貞吟

2015 法屬玻里尼西亞客家族群邊界與認同在地化《全球客家研究》5: 85-148。

童元昭

2012 大溪地唐餐／Maa tinito 的在地性《中國飲食文化》8(2): 71-102。

〈英文文獻〉

Koo Meng Tong I

2018 *La Communauté Chinoise et le Koo Meng Tong I, 1918-2018*. Papeete: Tahiti.

Ly, J.

2013 The Hakka in Tahiti. *Global Hakka Studies* 1: 215-234.

Saura, B.

2002 *Tinito: la Communauté chinoise de Tahiti: installation, structuration, integration*. Tahiti: au vent des îles.

Sin Chan, A.

2007 *Proverbes et dictons des Chinois hakkas de Tahiti (T'ai kai t'i hac gniam gni)*. Tahiti: Éd. te lte.